



北京
話史

負責文教、資料、調研、圖書的同志：

我社為慶祝開國一週紀念，並遵照毛主席學習百年史的指示，特地編印「北京史話」一書，紀述近四十年來首都之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外交、文化，以及歷次革命運動的經過，殉國先烈的業績，俾讀者對自帝王、軍閥之都，進入人民之都這一階段中的艱辛歷程，有深刻的認識。該書現已發行；且蒙

大力提倡，首先訂閱，茲將已出版的該書上編一冊，隨函寄請惠閱（推銷性質，並非贈送，如不擬價訂，懇即退還）、批評、指正！閱後，如以為還有一點參考的價值？懇求在經濟上給予幫助！匯款訂閱，以資挹注，而使續寄；並乞賜函你屬各分支單位，或關係方面，作一介紹，以示鼓勵！以上，可否之處？希勿吝見答為盼！

此致

請注意：

一、本書收到後，如不擬價訂，請於五月內原址退回（打包時，平攤勿捲摺），如留閱日久，或已損污、編號、蓋了各式圖章者，應請原諒，作為價購。

二、本書分上、中、下三冊，連郵費傳人民幣

萬

仟元正（東北區傳幣北幣

拾

萬元）

零售每冊：人民幣

萬 仟元（東北區東北幣

拾

萬元）

上、連郵費共一併函付者，介紹人之一部，得享免費贈閱之優待。4. 每戶一次訂購本書五部以上者九折，十部以上者八

五折，廿部以上者八折，五十部以上者七折。
三、本書如蒙介紹，請將受令各單上的名稱、地址見告，以便聯系。



啓

尤其是今天國內致力於這一「冷門」的尚不多見，示範觀摩，兩俱難得，倘讀者能加原諒，說：「有，總比沒有好！」「學習，總比不學習好！」那末，我們就希望能夠通過這一層關係，讓豪章前進一步，留待他日立功於寫「人民文史」的準備。

毛坯製作的動機既如上述，現在該把這毛坯的藍圖說明如下：

一、書名「史話」，年代應無限制，即使單從建都說起；則北京之成為首都，至少當起自明季，只是我們的範圍是「近代」；不過這「近代」，若以百年為起迄的話，上溯可至清咸，同間，而我們還嫌冗長。我們現在要裁去以上的六十年，祇取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以至北京解放後的四十年。因為範圍小了，蒐輯資料可以比較地有系統，精力集中一點，錯誤也可少些，這對於人力、財力、智力欠缺的我們，是不得不如此的。

二、本書的取材：凡此四十年中在北京所經過的一切如政治、經濟、財政、外交、文化、教育、交通等，均在包括之列，這個當中，有封建的專制的黑暗的一面，有革命的英勇的壯烈的一面，有民主的進步的光明的一面。

三、本書的體裁：並不是把這四十年的經過一如「紀事本末」式的用流水筆法寫出，而是各就某一部門之可另成一段落者，由編者分別約略纂述。這些文字，必須要分則獨立，合則為一，首尾相顧，上下一貫；資料運用，或取共和，或專一環；共和者宜脈絡分明，使人可從此中得到若干索引，為他日製作專書者的參考；一環者，當就此環的菁華逐一發揮。

本書的文體：在原則上自以語體為宜；但開有富資料，善纂述的作者而不慣以語體成文的，我們自不能因此小節，摺諸門外，比如某一會上，大家都以國語發言，其中一人，對此似有難色，期期艾艾，半晌不能成一語，在這樣的情形下，我們只好讓他說普通的家鄉話，才不至把他對大會的貢獻因吐舌扞格而埋沒。因為平日能注意此四十年來的經過，胸中略有貫串，案頭稍有資料的人，其年輪多數在五十開外，一時改作語體，不但習慣上有許多不便，技巧上也有障礙，為了照顧這一點起見；所以我們決定先求內容，不計文體，幸而這些所謂「文言」，實際亦甚淺近，充其量不過筆調子而已，不過這些調子，自然希望儘可能的減少，以至於無。倘不諒者誤以為我們有提倡「復古」之嫌？恕我們不再另提答辯了。

爲帝王、軍閥、官僚，有開階級享受而致力的，已在逐漸淘汰、轉變、改造。我們爲了要研究這過程中的一切，所以在這人文薈萃之地，掘取了一個最近的年代，即自清末至解放，這一段時間，約爲四十年，雖然以此假定作爲「中國社會發展史」的研究，失之過短，但此四十年中的劇變，實較過去的數百年爲甚。

清末，以少數革命黨人，發爲民族主義的愛國之論與若干激烈分子的個別暴動於外，滿清的投機官吏自腐於內，因而消滅了統治二百六十年的滿清帝國（滿清帝國的消滅，此爲近因，太平天國領導的農民戰鬥，動搖其統治基礎，喪失其統治威信，啓發了進步人民的民族思想，釀成暴動，乃其遠因）。然而軍閥專政，各據一方，竊國、盜國、賣國、辱國，殘民、虐民、殘民、食民之政，實不讓帝王封建之世，而各國主義者的陰謀，於此益發大肆深入，經濟的、文化的、軍事的、政治的，都有系統地滲透了中國社會之各階層，此一時期，帝國主義的侵略細密，得以乘虛而入吾人之血液，分佈的範圍，遍於人身每一角落，中極之深，爲歷史上任何一時期所未有。因爲是慢性的殺害，故難中之而不易自覺，其時思想想已傳至中國，北京實最早接受之，五四運動之發端，即一明證。蔣中正曾假而起家，半途爲謀自身之權利地位計，又與帝國主義相勾結，由假革命而走上反革命的階級，對進步思想與進步人民的壓迫殺戮之慘，亦爲歷史上任何一時期所未有，此一時期之北京，雖因專制政權的南移改爲「北平」，表面上漸形寂寥，實則這個寂寞倒是北京歷史上比較超然的一個時期，却想不到這一超然竟帶來了北京的新生，湧現出一個真正的人民的世紀。毛主席在六盤山上有詩云：

『六盤山上高峯，紅旗漫捲西風，今日長鞭在手，何時縛住蒼龍。』

如果說「蒼龍」即是反動政權的代名詞，那末，我們不妨假想此「蒼龍」之長度爲南起江淮，中經平津，止於遼瀋；其在江淮者爲首，在平津者爲身，在遼瀋者爲尾，歷中間，正包括着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決定性的勝利：即遼瀋、平津、淮海之役。「蒼龍」之尾既處於遼瀋，而身首尚在關內，身爲心管所寄，關腹斬斷，「蒼龍」可謂已經縛住一半有餘，而北京適爲縛住「蒼龍」過半，發覺致命，斬去其首的所在，六百九十年封建專制的陰影，「文明版」式的「中華民國」的傾側搖搖（文明版是不徹底的改良主義者），都因「蒼龍」之縛，而告結束。於焉以始，於焉以終，又於焉以始，這一連串的始終，終始，是應該站在現代的觀點上，有一連串的敘述的，下篇所記，爲一連串中的最後一串，即「文明版」式的「中華民國」的傾側搖搖的一個階段，以此作爲研究中國近百年社會發展史的線索，可能有一點小幫助，同時，我們也希望有人能在那一方面，不論經濟的、政治的、軍事的、文化的、社會的，作出種種的提示，引起讀者的興趣，進而搜索提示中之每一環的未發現的真相，並糾正舊社會歷史工作者的認識的錯誤，爲後之治此者引上一條正確的道路，實爲當務之急。

編者識。

凡是講近代史或近百年史的人，都是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起，這實在是一個自然的敗落，天然的界限。無論從內政外交那方面看，都有它一幕緊接一幕密切聯系着的事情。但是在一階段裏又可分爲兩截，前半截是由一八四〇至一八一〇即宣統三年辛亥，後半截則是由辛亥革命直到現在全國解放，人民革命真正成功。從這近代史整個的階段看，廣大人民反對專制，要求解放，在革命的過程和發展中，都有其自然的規律，凡是學習過社會發展史的人，即知道這是必然的。關於前半截的事情，我們暫且不談。只想談一談由辛亥到現在幾個

重要節目，其內容是偏重於「歷史資料」的蒐輯，藉供專門研究者的參考。

我們這一瞥，第一眼首先看到的，便是這一階段雖然比任何時期都複雜，同時也比任何時期更重要。辛亥革命雖然不徹底，而表面上總算把封建政權推翻，民國十三年後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大革命，以至近年的解放戰爭，因為廣大人民的擁護，把舊的軍閥打倒，把新的統治特權和剝削階級（包括貪污官僚，惡霸地主等）完全肅清，才能得到今日的光明。這一段由舊社會走向新社會的經過，即是今天我們所應當注意的。

辛亥前夕的北京城

由辛亥到現在——一九一一——一九五〇正四十年，凡五六十歲的人，對於此四十年間事，大都還記憶猶新。蓋四十年的光陰固不算長，然而也不算甚短，不過其中曲曲折折，由封建專制，以至軍閥割據，官僚剝削，最後又變成新的專制，更大的反動，其間復經過日帝國主義外族的淪陷。在這許多階段中，雖皆有其失敗的必然性，若單從北京政治地位和內幕言，真可稱為風詭雲幻。我們有時閉目一想，或偶爾和老朋友談天，均歷歷如在目前，恍如昨日事，又儼如隔世矣。現在革命已快完成，一切漸入常軌，最重要的是我們已獲得了革命的真理——馬列主義。見毛主席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。從整個國家來說，也和人一樣，正是「不惑」之年。今後我們再不至於摸索前進了。我們已經有了燈塔。

辛亥革命是與太平天國的革命有不可分離的關係。自從一八九四甲午戰爭而後，打破了滿清方面以及一般奴才所歌頌的同光中興之局。接着便是一八九八的戊戌政變，一九〇〇的庚子義和團的排外運動。廣大人民已起來堅決地要求改革政治，然而封建統治政權還想用拖延政策欺騙人民，更刺激了人民愛國熱忱。北京雖是封建政權的根據地，一般人也都知道這個政局決定要變，但不能預測變成什麼樣子而已。尤其是大多數的革命志士，熱血青年，大都趨向革命，反對不徹底的維新，如炸良弼等暗殺事件，即在北京層出不已。所以有人說滿清之倒，完全是被這無範圍的「心潮」所衝沒，實在不錯。因為這次革命的成功，民軍的武力，不算很強，而四萬萬人的心理，則是不可抗的無形武力。所以各省紛紛獨立，各地軍隊先後起義，北京的封建貴族們，便手足無所措的胡亂掙扎，結果是一點用也沒有，不過自掘墳墓而已。

武昌起義的信號

武昌起義，本定於八月十五日，和元朝末年「八月十五殺鞑子」的傳說相合，因謀洩乃改於八月十八日。至此一聲砲響，振漢族之雄風，開中華之新運動，不僅全國響應，北京尤爲震驚。聞許多老輩言，當時北京社會表面上雖甚安定，而人心浮動，金融物價亦不穩，至十九日武昌警報之急電到京，（按清之奴才湖廣總督瑞澂即於次日十九逃跑。滿清政府僅革其職，而仍令署總督圖功，冀挽回頹局。當時內閣總理大臣奔動，曾力爭於隆裕前，請拿問瑞澂。隆裕弗聽。奔動曰：封疆重臣，棄職逃去，豈可官貸？隆裕曰：庚子那一年，咱們不也是逃走的嗎？奔動語塞。退而忿然告人曰：小舅子保駕！指載澤也。瑞澂爲載澤姐夫，載澤爲隆裕妹夫，其淵源如此。時載澤爲財政大臣，載洵爲海軍大臣，載濤爲軍諮府——即參謀部大臣，均滿政權親貴中之有力者。又奔動在慈禧當國時，即以貪黷著稱中外，迨載灃監國，滿族親貴，各樹一幟，政綱益紊，奔動反若較穩靜，而生不平之感。於是不得不起用袁世凱。見黎元洪軼事，及一士隨筆。）時已下午，前門外各戲園正演夜戲，下令停演，並停止各城夜市。至次日北京社會，始漸不安，尤以衙署之京官爲甚。各旗員顯官，紛紛回米，有一戶購買一千包者。商家居民向大清銀行——即後來之中國銀行提款，秩序大亂。於是南省京官有離京者，人心皇皇，如大禍之將臨。直至袁世凱入京，趙秉鈞重長民政部，人心始趨安定。

在此期間（未起用袁世凱前）京師謠言繁興，羣情惶惑，朝野士夫，主張紛岐，唐景崧化的滿清政府，已不復能加以統御。民政部大臣桂春，想鎮壓革命風潮，揚言將屠殺城內漢人。並招旗籍巡警二千人，將陸續以代漢籍巡警，因此人心益恐，幾釀巨變。衆以前民政部侍郎趙秉鈞，乃首創京師警察之人（按趙秉鈞爲袁世凱的特務頭子，滿政府見於革命思想之膨脹，炸彈案之迭出，乃設民政部從事鎮壓，袁即薦趙爲民政部侍郎，創辦京師警察），須其來以弭此禍，密言於奔動（內閣總理大臣）與徐世昌（內閣協理大臣），召秉鈞於彰德（世凱所居），令任民政部大臣。並命鐵路總局長葉恭綽星夜開專車北上，秉鈞到京，一反桂春所爲，即日遣散旗警，人心漸安。而滿清政權張皇之色，亦於此可見。

袁世凱入京前後

按推翻滿清，民國成立，人民一致要求，各省獨立響應，固爲主要原因。而袁世凱入京一幕，亦屬重要，使滿清政權無可再戀，只得俯首遜位。蓋袁本神奸大盜，善用權術陰謀，滿人尚倚之爲擎天玉柱，彼實已已圖謀高位，論者謂起用世凱實滿人自速其亡，爲辛亥重大關節，因亦特立此篇，以觀察其因果。

當慈禧光緒於一九〇八戊申相繼逝世，載灃以攝政王名義監國，旋即將世凱放逐，且幾不保首領。戊申十二月十一日正一九〇九一月二日，內閣奉上諭：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，夙承先朝屢加擢用，朕御極後，復予懋賞，正以其才可，用，俾効馳驅。不意袁世凱現患足疾，步履維艱，難勝職任。袁世凱着即開缺回籍養病，以示體恤之至意。藍筆繳進，欽此。論文中可注意者，「不意」之下，大有文章，語意亦不聯貫。正與慈禧之對岑春煊相同。意即念在前勞，不加誅戮。乃是特別寬大。當時外間傳說，謂或係隆裕后欲替夫光緒報仇，實非是（後來如「陳石遺年譜」云：「初德宗以戊戌事，積憾於袁世凱極密，無如之何。及崩後，相傳瀛臺各處抽屈，發現：袁某着即凌遲處死字樣。袁亦知之，頗自危。……」及胡思敬「國朝備乘」云：「隆裕奉德宗遺詔，命誅世凱。監國與張之洞力解之，遲遲未決。趙炳麟偵得其情，乃邀陳田各具一疏參之，而世凱款段出都門矣。思敬爲當時名御史，與趙陳交尤密，對於參袁內幕，常知其詳，世人多沿其說）。蓋世凱被逐，固與戊戌案有關，而其陰險跋扈，最爲主因。當袁在軍機時，承慈禧殊寵，對於載灃諸親貴，常以少不更事輕之。每不假以辭色。一旦監國，遂修風怨。且慮其跋扈難制，故欲除之。以張之洞諫而止，僅令開缺回籍。又袁之被逐，當時中外輿論及外交方面，均極注目。宣統元年正月之「東方雜誌」第六年第一期「記載」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大事記云：「袁世凱開缺回籍，論見諭旨。是日以那桐爲軍機處學習行走，論亦見諭旨。世凱開缺之原因，傳言不一，中西報章，咸有評論，然未可據爲信史也。聞事後各國公使，咸疑世凱開缺後，我國於外交政策，有所變更。爭向外務部詢問。旋經外務部明白答覆，各國亦無後言云。」按袁在外務部時，主張聯美制日，而載灃則主親日，各欲實現其帝國政策。同年二月「東方雜誌」第六年第二期「文苑」中，有非親「詠史」詩云：「詩傳脫距萬人歡，終是君王禮數寬，十載橫刀誇健者，幾時鑄鼎發神奸。夢回天國魂猶斷，倚到冰山膽共寒，慶父何當舒魯難，吮臍門客已朝餐。」又有非親「詠史和井親」云：「十年重疊賜宮緋，又見祁門款段歸，牛鼎易調妨折足，多疑直觸亦投機。心餘野史論功罪，家有門生論瘠肥，不到燃脂真厚幸，橋山弓劍一歎歎。」詩雖不佳，要亦可見當時輿論。又世凱被逐延放逐離京時，朝官到西車站送行者，僅寶熙、嚴修、楊度等三五人而已。以一時炙手可熱之權臣，下野後如此蕭涼，更足見封建宦場冷燬之態。

武昌起義後，滿清先命蔭昌率各營之雜牌軍南下，蔭昌畏怯不進，滯留中途。我們今日檢閱當時記載，與潛末實錄，蓋自辛亥八月十九日警報到京後，清廷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之中，其時清廷分爲兩派：一派主張嚴申軍令，用親貴督師，以張撻伐；一派主張起用袁世凱，而又狃於戊申之罷斥，未便實行，爭不能決。乃奏請隆裕太后決定，

隆裕主起用袁，議乃定。其後一切均由此發軔。監國載灃方震怖失措，自忖此局非已所能了，不能持異同，惟冀其不念舊惡耳。

以袁世凱爲欽差大臣督師

辛亥八月十九日夜武昌消息傳到北京，由二十至二十二日三天內，清政府諸人無不張皇失措，於其每日所發諭旨，可以概見。一方面想用兩鎮——即兩師武力來鎮壓人民，同時又表面上採取寬大政策，放糧賑濟，冀陶軟化分徵革命勢力。但其武力與陰謀，均未生效。以革命起於川鄂，於八月廿二日，即起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，岑春煊爲四川總督，負責一剿撫事宜。一諭旨並云：「均著迅速赴任，毋庸來京陛見。該督等世受國恩，當此事機緊迫，自當力顧大局，勉任其難，毋得固辭，以副委任。」二十三日又諭：「袁世凱現簡授湖廣總督，所有該省軍隊，暨各路援軍，均歸該督節制調遣，蔭昌，薩鎮冰所帶水陸各軍，並著袁世凱會同調遣，迅速事機。」二十八日又諭袁世凱擴其大權，所有長江一帶水陸各軍，均著暫歸該督節制。九月初六又撥宮中內帑一百萬兩，專作湖北軍餉之用。並以袁世凱爲欽差大臣，一切由袁相機辦理，北京的軍諮府，陸軍部不爲遙制，以一事權，而期迅速成功。按蔭昌即陸軍大臣，已受袁節制矣，尙何遙制之足云。按八月二十三日清廷即發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，至九月初六袁始電奏起程日期，遲至半月之久。至初九日下罪己詔，至十一日即免去奔動內閣總理職，以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，長江水陸各軍，仍歸其節制調遣。並授奕劻爲弼德院院長，以徐世昌、那桐、榮慶等充任弼德院顧問，由袁另組責任內閣。十二日並電世凱迅速來京（按此時各地革命風潮，日益澎湃，十三日又頒諭旨，中有：「朝廷實心與民更始，不忍再以兵力從事之意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或亦可渙然冰釋乎。至種族革命之說，容或有之，究居少數，況同在九州之近，更何有畛域可分，舜東夷而禹西羌，皆中夏之聖帝，其忍以自相殘賊，同付論胥。」措詞極妙）。此時之袁，無異滿清之神人，亟盼其作出奇蹟，挽回頹勢。

其時長江各省已先後獨立，袁猶故作恣態，懇辭內閣總理大臣。九月十九日又諭：「袁世凱電奏，內閣總理任極重大，深慮弗克負荷，懇請收回成命等語。現因時局危殆，羣情似擾，非實行改良政治，無以弭亂源而維邦本，故俯從臣民之請，另行組織內閣，與民更始。該大臣久歷中外，誠信素孚，且世受國恩，秉性忠亮，必能竭誠贊助，力顧大局，故特授爲內閣總理大臣。該大臣務宜追念先朝倚畀之隆，體念時勢艱危之極，勉爲其難，毋再固辭，著迅速來京任事。」可謂情見乎辭。九月十九日又諭依憲法信條第八條，命袁爲內閣總理大臣。至二十三日袁

已到京，即命節制近路軍隊，惟仍留內閣總理大臣。二十四日又降諭旨：「前據袁世凱電奏，再辭內閣總理大臣。該大臣現已到京，本日召見，復經面奏懇辭，情詞肅切，經朕曉以大義，并勉其力任艱難，該大臣公忠體國，時局至此，當亦不忍再辭。著即到閣辦事，悉心籌畫，保全大局，用副朝野之望。」蓋世凱具有深心，必須根據信條，站穩腳步，方肯就職。而滿清諭旨，亦廢去有厚望焉等君主口吻，代以用副朝野之望。由這一點可以看出在士大夫階層，大半都是反對袁的，但有些人總是相信他還有辦法，寄以新的希望。

袁世凱人都組閣

據北京父老云：辛亥那年自武昌起義後，京師人心惶惶，官民均極不安，有的回鄉，有的屯糧。自袁世凱入京，人心即趨安定，金融物價，亦漸平和，大家認為他總有辦法，決不會像滿清親貴們那樣沒出息，張皇失措。」

均是見袁在當時之期望，而為竊取第一任大總統之先聲。

世凱入都後，在內而人事，外面國際，有數事足可研究參考。一為袁對往訪者，必痛言世受國恩，當茲危難，誓鞠躬盡瘁，捐生以報。蓋義形於色也。至後駐外使臣陸徵祥等電奏，請清室遜政，岑春煊等之電亦至。適李家駒詣世凱，世凱以電示之，並手批岑電曰：此又一陸徵祥也。且指謂家駒曰：老柳（家駒字柳溪）你來看，這是忠臣說的話嗎？故說者或謂世凱初意猶非必欲覆清。但其是否誠意，抑故意做作，則非外人所得知矣。又袁入京組閣，清廷不惜再三勸慰，始勉就職。攝政王載灃以其曾罷世凱，深懼將不利於己。乃由載灃訪袁，私探其意。袁以愕然之狀對曰：攝政王盛國，係受先皇太后之命，某何人斯而敢置喙，滿歸告還，以為可無他變。翌日即有命灃以醇親王退歸藩邸之諭旨。論者皆云實出袁之要求，集大權於一身，不久清社亦屋矣。

又一事，謂袁入京後，日本公使某氏，與袁有舊，曾往請見，密詢袁對中國前途看法及意志。世凱力言靖亂報國，至死靡他。忠誠溢於言表。氏曰信乎？袁益指天誓曰。某氏辭出，遂以所得情報達之於本國政府。英國公使朱爾典，與袁交最深，亦往見袁，但敘契闊，初不及他。只云猶憶袁昔清政府以三寸紙逐公出，世人皆為公危，吾以為從此不獲相見矣。不圖今更再晤於此也，袁為之變色。自是以計覆清，而日傳則志袁見欺，交誼遂絕。迨民國成立後，袁猶數與通書，竟置不答云。此二事係後來外交界傳出，是供治舊聞者之參考。而帝國主義者對我國政治之干涉陰謀，亦於斯可見（按自袁起至北洋政府，對外交方面，均感覺日人橫暴，英人狡詐，惟北洋政府所恃之「關餘」，「鹽餘」，俱掌握在英人之手，不能不仰其鼻息。其老奸巨滑之手段，較之日人，更覺可畏。觀其對世凱之

談話、尤證明其陰險)。

世凱入京後三日，於九月二十六日即將內閣組成，由上諭發表。爲第一次責任內閣，當時陣容爲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，其他爲：

外務大臣梁敦彥	副大臣胡惟德
民政大臣趙秉鈞	副大臣烏珍
度支大臣嚴修	副大臣陳錦濤
學務大臣唐景崇	副大臣楊度
陸軍大臣王士珍	副大臣田文烈
海軍大臣薩鎮冰	副大臣譚學衡
司法大臣沈家本	副大臣梁啟超
工商大臣張謇	副大臣熙彥
郵傳大臣楊士琦	副大臣梁如浩
理藩大臣達壽	副大臣榮勳

共計十部，在梁敦彥、嚴修、王士珍、薩鎮冰、張謇未到任前，以副大臣暫行署理，惟度支則由紹英，陸軍則由達壽暫行署理。觀此名單，很少舊人，而梁啟超、薩鎮冰、張謇、楊度、陳錦濤等，在當時尤係前進人士。舊人物中曾任大學士者，如紹昌、林紹年、吳郁生、恩順等，均打入前內閣總理大臣奕訢所主持之弼德院，作顧問大臣，亦不過「圓面子」，養老而已。梁啟超始終不來京，後以蜀人曾鑑繼法副)。

內閣組成後，此後大事，有：

十月初六日清帝告廟宣布重大信條十九條。

十月初八日，因馮國璋進軍佔領漢陽，清廷封馮二等男爵。所下諭旨，口氣又變。如謂：「武昌此次兵變，自稱係爲政治競爭，朝廷不忍以兵力從事。飭督師大臣袁世凱暫停進攻，……反復開導，該黨首黎元洪迄不就撫，仍復左右進攻。實屬甘心擾亂治安，荼毒生靈。」

十月十六日諭監國攝政王，以醇親王退歸藩邸，不再預政。以世續、徐世昌二人爲太保，護衛聖躬云云。

十月二十日諭旨：「內閣代遞陳昭常(吉林巡撫)等電奏，覽悉。此次醇親王懇辭攝政王之位，並確照立憲政

體，凡用人行政，一切均責成內閣總理大臣擔負責任。惟有頒布詔旨，需用御寶，及覲見典禮，予率同皇帝將事，與先朝垂簾聽政制度，迥不相同。正係實行改良政本，以示不私君權，與民更始。乃該撫等輒以廟堂之上，先事紛更，及政權不一，宮廷不和等語，漫相推測，實未深悉朝廷大公無私之至意，殊屬昧於時勢。著傳旨申飭。」可見袁氏掌握大權後，各地舊人之反映，此時清廷，有如日本天皇，論權力或尙不逮焉。

退位之一幕

在九月這一月中旬以至十月上旬，全國各省及大城市（如上海蘇州重慶）均紛紛獨立，各省代表集於上海開會，十月十三日議決，臨時政府設於南京。十四日並舉黃興爲大元帥，黎元洪爲副元帥（後又改爲黎正黃副）。北京方面，則於十六日攝政王退位。十七日袁世凱即委任唐紹儀爲全權代表，與民軍議和。十九日民清兩軍續議停戰十五日（原爲三日期滿），各省軍政府公舉伍廷芳爲議和代表。此時滿清政府，猶希望仿效日本，君主立憲，代表唐紹儀亦傾向民軍，主張共和，世凱旋即撤唐，直接交涉。時朝野對袁，均期待甚殷，而袁則成竹在胸，操縱自如。岑泉居士（楊壽枏）「覺花寮雜記」述當時之情勢云：「宣統辛亥八月，武昌事起，警報初至，樞廷倉皇失措，集議終日，始令陸軍部尚書蔭昌樓（習菴漫筆「燕京瑣錄」云：世皆知盛宣懷有憾於袁世凱，不知袁之再出也，盛主之甚力。武昌難作，清廷命將出師，以蔭昌爲督師。盛聞之曰：事變至此，蔭昌樓崇奚足以當之？非袁氏莫屬也。因言之於載灃，同入覲，次日即有上諭，以袁世凱爲湖廣總督。此說關於袁之起用內幕，亦足以備參考。統兵出征，籌備餉械，援接五六日始成行，而東南各省已紛紛響應矣。袁頃城內召，朝野嚮望，以旋乾轉坤之任屬之。朝士分君主民主三派，君主派望其爲日本之德川，民主派望其爲美之華盛頓。入朝之日，都人傾闕，闔溢九衢，始至以君主立憲爲標幟，宣誓告廟，豐采毅然。旋即改組內閣，收攝政權，宗旨漸變。當是時張勳方固守南京，馮國璋攻下漢陽，梁巨勳於鎮山，轟擊武昌，唾手可得。乃內閣忽下令馮國璋停戰，又令張勳退出南京，識者知大局不可爲矣。遜位議起，親貴中惟禮王澤公力持異議，周子虞（自齊）訪余曰：舉朝推袁，而澤公力阻奈何？余曰：舉朝一致，澤公何能爲。曰：此公爲監國所信任，外人所推重，舉足頗有重輕，君盍密勸之。余謝不敏。未幾征鄂諸將倒戈犯闕，議和專使，力主共和，電檄紛馳，風鶴四驚，人心皇皇，曹署星散。」作者楊氏曾任度支部參議，時尙書即載灃，故與澤澤。上文記起義後至遜位時京中情形，士民心理，均關重要。所謂希望其爲德川或華盛頓，尤足見一般心理之趨向。

遜位前，清廷知大勢已去，無可挽回，不得不將希望寄託於世凱。十一月初六日諭：袁世凱公忠體國，匡襄大

局，錫封爲一等侯爵。再辭再授，毋許固辭。而京師地方情形，亦可於諺中見之。所謂：「現在訛言繁興，人心不靖，誠恐民聽易惑，致生誤會。辦法正在磋商之際，凡我臣民，尤不容妄啓謠言，輕信浮言，以維秩序。」但袁始終堅辭，不受爵封，其意蓋灼然可見。

上文曾記英使朱爾典與世凱之談話，關於辛亥南北議和一幕，英使又作調人，此實帝國主義之陰謀手段，無論內政外交，莫不干涉，尤其昔日每當我國政權變遷之際，總有外人作幕後活動。陳慶龍「步蕉亭雜記」云：「聞馮（國璋）軍佔據漢陽，余以電話詢之，項城復電云：未得鄂中確息，其志不在恢復，可爲駭異。余復急電馮都護，復云：奉京電已有英國公使出任調和，北軍暫在漢陽駐紮，不得越雷池一步。余聞之實甚。」（按頃彼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。後來論者均謂清軍不進，爲袁盜國預謀。其說亦非。蓋以全國人民力量，即使進兵，亦必失敗。）在議和與退位之期間內，北京政局，實甚複雜，大類日固在優待皇室條件之擬訂。其中又發生兩小枝節，一爲禁衛軍改隸問題，一爲滿蒙王公封爵問題。時禁衛軍共四旅，均駐西郊，且有不穩之謠。後由當事者加以保證，允不解散，方告解決；滿清蒙古問題，則增入優待條件內。又宣布共和，實隆裕所主持獨斷。當時滿清宗室親貴，猶做昧的反對共和，載澤堅持尤力。隆裕知大勢所趨，均嚴止之，或婉止之。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，單獨請見者多人，隆裕或見而告諭之，或竟不見。二十五日（即滿清退位之日）晨，猶有數人擬面阻退位文告之發布，隆裕告內閣全體，我們先辦了這事，我再見他們。免得又有耽擱。遂將退位詔書，蓋印發出。途諸人入阻，已屢及矣。論者謂隆裕之明大勢，有決斷，實非尋常。其實清政腐惡，人民政治覺悟提高，何人亦不能抗拒此革命新潮也。

退位文告

至於退位之詔，葉恭綽云：「本川張錫鑾（金坡）令人撰得一稿，作爲事先準備，內閣諸人嫌其冗長，交余（時任鐵路總局長）修正，余以爲時尚早，密置袋中，至十二月二十左右，以時機漸成熟，方擬動筆，而南方民軍方面已擬好一稿，電知北京，後聞係張季直、趙竹君二人所擬。遂由某君修改刪定。稿末豈不盡數四字，聞由某太史手筆，當時士大夫皆甚稱其用句恰當，蓋舍此四字外，無可收場也。」另稿係張季直訂年譜，及其子季若爲撰之傳記，中附有胡漢民致謝函書，謂清室退位之詔，係翁手筆。其說云：「是時退位條件已定，弟適在滬，共謂須爲稿予清廷，不使措詞失當，弟遂請季直先生執筆。不移時脫稿交來，即示少川先生，亦以爲甚善，照電袁。而袁至發表時，乃竄入授彼全權一筆，既爲退位之文，等於遣囑，遂不可改。惟此事於季直先生，無所庸其諱避。」與上

事可合看，均不失爲退位一幕之珍聞。

按退位文並不冗長，直切委宛，不愧狀元手筆。原文云：「前因民軍起事，各省響應，九夏沸騰，生靈塗炭。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，議開國會，公決政體。兩月以來，尙無確定辦法，南北陰隔，彼此相持，商輟於途，士露於野。徒以國體一日不決，故民生一日不安，今全國人民心理，多傾向共和。南中各省，既倡議於前，北方諸將，亦主張於後，人心所嚮，天命可知，予亦何忍固一姓之尊榮，拂兆民之好惡。用是外釋大勢，內審輿情，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，定爲共和立憲國體。近擬海內厭亂望治之心，與協古聖天下爲公之義。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爲總理大臣，當茲新舊代謝之際，宜有南北統一之方，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，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。總而人民安堵，海宇乂安，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，爲一大中華民國，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，優游歲月，長受國民之優禮，親見郅治之告成，豈不懿歟。」胡爾所指世凱竄入者，蓋一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一句，則置南京臨時政府於何地。文告後即附優待條件各件。時辛亥十二月二十五，正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也。中國兩千年來之封建統治，由此推翻。

辛亥革命的不澈底

我們回顧這次的革命，顯然是失敗的。因爲領導者，大部分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，最富於妥協性，認爲只要把封建制度打倒，即算成功。正是中山先生所謂：「辛亥之役，以爲使清帝退位，則民國告成，謳歌太平，坐待共和幸福之降臨，此外無復餘事。」白蕉論此次結果，最爲警闢，他說「辛亥的光復事業，僅能在浮動感情的排滿口號之下，成功了極狹義的民族革命。至於民衆方面，見清政府倒了，自也以爲大功告成，革命熱忱頓在無形中消滅。結果，民國共和政體的招牌掛起了，而南京政府取消以後，繼起者正是專制餘孽袁世凱，孫中山雖想了各種方法，使他就範，無奈他骨子裏不是一個革命家，而是反革命家。其次是領導革命的中心——民黨，他的本身組織不健全，革命立場不一致，又多妥協性，黨員行動，沒有紀律。一方面知道袁世凱靠不住，一方面還是躁進，急於想憑藉以求成功。最爲緊要的失着，是只知注重軍事，而不知深入民間。又過於迷信政治，而無民衆政治訓練與組織，且不知國民經濟的改造。」這是前十五年的話，在今天看起來，還是正確的。

建都問題的爭論

據沃丘仲子「袁世凱傳」謂「南北議和之惟一祕密條件，即第一任總統，必推世凱。孫中山慨許避位，然猶遣使要其至南京就任。」我們看一九二二（民國元年壬子）一月一日（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三）孫中山就臨時大總統於南京，改用陽歷，以是日爲民國元年元旦。至二月十二日（舊曆臘月二十五）清帝退位。

二月十三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辭職。

二月十五日，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。

二月十八日，孫總統派蔡元培、汪兆銘等往北京，迎袁世凱南下就職。

二月二十日，參議院選舉黎元洪續任副總統。

在此一星期中之政局，民黨方面迎袁南下，自是中山想用種種方法使袁就範之一。惟當時輿論已引起建都問題，究竟是應該在北京或南京？論者皆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（北伐後之建都問題，爭論甚烈，大都不出此次範圍。）當時最重要的意見，有章炳麟致參議院書，略謂建都議起，南北殊言，遷都金陵，其害有五。一、顧問堅持都金陵者，謂燕京有使館礮台之險，亡清汙俗之餘，徙處南方，非獨避危就安，亦以滌瑕蕩垢。不悟政紀修明，則舊汙自化。豈非自取，則攻具無施。此二者不足以成遷都之說。今復舉利害較之，中國幅員既廣，以本部計，燕京雖偏在北方，以全部計，燕京則適居中點。東控遼瀋，北制蒙回，其力足以及。若徙處金陵，威力必不能及長城以外，其害一也。北方文化已衰，幸有首都爲人文所輻輳，若徙居金陵，安於煖地，苦寒之域，必無南士足音，將北民化爲蒙古，其害二也。清室退位以後，組織新政府者，當爲世凱，若迫令南來，則北方失所觀望，日將侵及東三省，而中原又失重鎮，必有土崩瓦解之憂，其害三也。清帝尙處頤和園，不逞之徒，尙思擁舊君以倡亂，非止一宗社黨也。政府在彼，則威靈不遠，足以鎮制。若徙處南方，是縱虎兇於無人之地，豈獨亂人利用其名，蒙古諸王，亦或陰相擁戴，其害四也。交民巷諸使館，所費物力鉅萬，若迫令遷徙，必以重資備償，當茲民窮財盡之時，而復舉此鉅帑，其害五也。今北方議者，或思改宅天津，其實猶不如仍舊。謀國是者，當慎度利病，顧瞻全局，而不可以意氣爭也。如必曰南土爲倡義根本，必不屈就北方，是乃鄙夫偏強之談，豈足數於賢者之列。縱依之說，則倡義之始，實在武昌，又不應以金陵爲宅矣。或言南中官吏，自愧輕材，以爲建宅北方，必被淘汰，圖保祿位，以撓大計，初不慮民生日瘁，外患相乘，竊以號稱志士，熱中患失，亦何至是？諸君子評議定命，豈忘國家久安之計，而徇朋友利祿之情，吾以爲必不然矣。」所舉諸條，確是針對當時情勢，末言及南中官吏生活問題，爲一般論者所未道，可見生活問題，實爲任何問題之基礎。以太炎之學問人望，此論一出，自無人能加反駁。又林庚白「辛亥回

憶」有云：「那時爭持得最激烈的大問題，唯一是遷都南京問題，袁世凱派人阻撓運動。據說袁太炎先生，也是被運動而出來堅決反對南部，這事實之可信與否待考，可是太炎的確以此為攻擊革命黨的第一砲。到最近還有人恭維，說他老先生話，畢竟是造成護國，你看東北的淪陷，不是强有力的證明嗎？那時反對南部最利害的革命幹部人物，太炎以外，好像宋教仁（敦仁）也有同一的主張。江蘇都督莊蘊寬，首先倡議，反對南部。有一天總理氣起來，大聲說：『莊蘊寬這人真該槍斃！』然而受了這許多名流學士和實力派的牽累，只好讓步。總理曾說過：『這樣一來，革命要遲成功三十年。』由今想來，總理真有先見之明。又據說宋應初想做國務總理，提議採用內閣制，設六部九卿，把各黨各派的人才集中，預定六部九卿的名單，研究宋的湯化龍，林宗孟（長民）都在內，因幹部裏不能通過，很快就打消了。那時革命的高潮，漸次低落，陳其美、張人傑等秘密籌劃，組織了一個暗殺機構，名曰鐵血刺除團，嚴密監視變節的軍人，以及貪污的官僚，軍閥，政客們。更不幸的，就是這黨面的同志，竟有因生活而叛變，反來殺害同志，陳其美的被刺，就有叛徒參加，這使我們最是痛心。」這一段足以說明南方的政局內幕，影響到北方，和北京的關係。即使沒有世凱派部下兵變，也不見得就痛快的定都南京。至於說章炳麟被世凱運動，出來反對，雖不敢妄下斷語，但我們相信炳麟決不是任何人可以威脅利誘的。末了說到同志們因生活而叛變，這確是一個最直捷最現實的問題，惟當時不大注意這些「小事」。

有計劃的兵變

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南京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（按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，十三日孫中山辭臨時大總統），十八日孫派蔡元培等來北京接袁南下就職，二十九日袁即主使第三師兵變，藉故不肯南下。此事雖係袁之陰謀，實屬四十年來北京之最大事件。因三百年來，自李自成入北京以後，中經一八六〇（清咸豐十年庚申）英法聯軍入京，火燒圓明園。及一九〇〇（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）義和拳起，八國聯軍又陷京師，滿清政府人員西奔，各帝國主義之洋兵分據京城。在這兩次帝國主義的鐵蹄下，社會雖極擾攘，人心亦極恐怖。但燒殺搶掠，地方損失之巨，實以此次兵變為最。以北方社會論，可謂元氣大傷，而反革命者不顧人民之生命財產，犧牲大眾以作藉口，亦罪惡行為之極。袁世凱記此事云：「壬子新春兵變，余在內閣官舍，初聞槍聲劈拍，以為新年爆竹（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八時，陰歷正月十二），乃人聲鼎沸，紅光燭天，知必有變。項城神色頗慌，屢問電話問西城情形，蓋其時本有禁衛軍欲入城為變之謠也。旋電燈亦滅，衆益無措，項城與余等乃避入地窖。時探報迭至，已知是兵變搶劫，項